韓昌黎與大顛禪師

潘文政

韓愈，字退之，又號昌黎，爲唐宋八大家之首。幼而聰慧，廣讀百家之書，唐貞元八年，時方二十五歲即中進士，可謂少年得志，目空一切。

愈在「原道」一文中，曾對佛有過這樣的批評：「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舉夷狄之法，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爲夷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讀了這段文字，固可想見其衛道精神，似乎義正詞嚴，慷慨激昂已極。有唐一代，正是佛教昌盛時期，蓋由佛教爲一有高深哲理之宗教，而且有其與儒門不同的宗教儀式和修行法門，使儒門有識之士，以及帝王公侯，販夫走卒，爭相趨奉，社會風俗，生活形式無不爲之一變。韓愈的起而「衛道」，原未可厚非，因人類很難脫離先入爲主，入主出奴的觀念，問題是如站在服膺眞理的研究立場，是否佛教有如韓氏所指的滔天大罪？如謂因佛教傳入中國而確使國人無父無君，遊手好閑，無所事事，那麼韓氏的指責與批評，佛教本身自應當予以檢討反省。可是佛教並未教人廢滅倫常，相反的它是更爲尊重倫常。其於社會文化之功罪，早有定評，姑置不論。本文是側重於韓愈因諫迎佛骨被貶後其生活思想的轉變。

當韓愈五十一歲時，因憲宗遣中使杜奇英率宮人三十迎鳳翔法門寺護國眞身塔所藏之釋迦文佛指骨事，因而上疏反對；因憲宗信佛甚篤，看到奏書中言詞過於激烈，大爲震怒，故由中央大臣（刑部侍郎）貶爲外官（潮州刺史）。他被貶後，因政治生命趨于黯淡，甚爲消極，日與山林爲伍。這段生活，正是促成個人反省自勵之最好機會。當時恰有禪宗南派高僧大顛授佛法於潮州，以禪宗「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相，豈有生滅」諸語開示法要，愈覺其所言者，多前所未聞，甚欽大顛之說法無碍，尤覺聞法後，使其被貶後的失意心情，得到不少新的啓示，遂與大顛成爲莫逆之交。這從

昌黎移袁州作書答孟簡的話，可資證明。他說：「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語者，故自山召至州，留郭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擾，因與來往。」在一個極端非佛反佛的人，尤其像韓愈這樣望重一時，名滿天下的大儒，對其素所反對的對象，能推崇至此，如果不是心折已極，如何能够出此，這可以證明他在潮州時思想已有很大的轉變了。又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大顛禪師：「侍郎韓愈，常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未答，時三平（三平爲大顛傳法弟子）爲侍者，乃擊禪床。師云：『作什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知拔』。退之喜曰：『愈問道於師，却於侍者得個入處。』遂辭而去。」由此更可以進一步確信他與大顛的交往，及深受大顛的影響。

自謫潮州返後，其對佛教之反對已不如以前之烈，其人生觀亦多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以前他是很看重功名的，至潮州謫貶，日與大顛接近，乃漸悟人生無常，一切非可強求，這是走向解脫之門的開端。以他這樣的夙慧深厚，凡遇大善知識，自是一點就悟。長慶四年時與張十八同効阮步兵詩云：「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富貴自縈物，貧賤亦煎熬，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脫鑣。譬如籠中鳥，六翮無所搖，譬如兎得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當然年齡大了，經歷多了，一切世情也看破了，以前所看不慣的，理不透的，想不通的，已能了然於胸，在官場功名中打轉而又有如許成就的他來說，得此一悟，實在是不容易的；他那時的心境，眞如陶淵明歸去來辭中所說：「悟已往之不諫，覺今是而昨非」了。

可是自古文人，都有一種天生傲骨，雖早已折服於佛法「外形骸，以理自勝」的道理，但仍不免爲歷來文人氣習所拘，不願落個背叛儒家之名，這又何苦？

須知自來眞理學術是無國界、無種界的，凡是眞儒者必不反佛，是眞懂佛者，對儒家崇尚人文的精神亦無不贊成；兩者雖在理論的剛揚上間有不同，在實踐的範圍上容有大小，但在使世人能正正當當的去過着人的生活，其目的却是殊途同歸。

諸佛菩薩皆出自世間，故無不着重人生。佛學所提示的救世方案，雖以一切衆生爲目標，但認人是最理想的；因人是處於苦樂參半的環境，因爲苦，才會產生解脫的要求，因爲也有樂，才不會窒殺求進的契機。韓愈早年的闢佛，是由於僅僅看重事相，未明白佛理，也許當時有意的去存門戶之見，致失去了許多早窺聖道大法的機會；不過後來得遇大顛，能虛心追求人生至理，學者風範，畢竟難得！（北師專）